

互联网使用频率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杨淇莹

重庆工商大学

摘要: 互联网潜移默化的改变着居民的认知和行为习惯, 对于其幸福感的影响不容小觑。本文选取 2017 年 CGSS 数据, 采用 Oprobit 模型进行探讨, 研究结果显示: 居民互联网使用与其幸福感呈正相关; 男性、年龄越大、文化程度越高、自评健康越好、与配偶同住的居民幸福感越强; 社会信任、社会交往、自评社会地位均正向促进居民幸福感。不同户籍、文化程度居民间存在异质性; 心理健康起着部分中介作用。

关键词: 互联网使用; 心理健康; 居民幸福感; CGSS2017

一、文献综述

主观幸福感从各个方面被学者进行研究探讨, 对于主观幸福感的定义, 社会心理学家迪纳 (Diener, 2000) 认为, 主观幸福感是一种积极、主观并且综合全面的评价, 是人们通过比较理想的生活状态和实际的生活状态, 从而得出的一种积极的肯定的感受。较高的积极情绪、对于生活状态有较高的满意度等通常都是伴随着较高的幸福感^[1] (崔亚雪, 2020)。

学术界对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有诸多研究, 不同学者出发角度有所不同。朱浚溢 (2014) 将影响幸福感的因素分成三类: 第一类是主观因素, 主要包括个人信仰、人格、个体性格、情绪、和自身努力等因素; 第二类是客观因素, 主要包括家庭生活、收入水平、生活环境、个人健康、人际关系、工作质量、教育背景、社会文化背景等因素; 第三类是个人自身不可操控的因素, 主要包括性别、年龄、遗传基因等^[2]。温勇 (2021) 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得出无论是作为个人层面的个人社会经济地位还是作为家庭层面的家庭关系, 都对居民主观幸福感产生积极正向影响^[3]。居民的身心健康显著影响其幸福感^[4] (Dolan et al., 2008)。身患疾病、情绪抑郁等会让人持续的产生不幸福的感觉^[5] (Anderson, 2014)。从社会学角度展开研究发现, 性别角色、家庭背景、阶层、就业、宗教信仰等都会对居民的幸福产生影响 (Blancherflower&Oswald, 2004^[6]; Chou, 1999^[7]; Dolan et al., 2008^[7])。

互联网以新兴信息技术的形式, 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公民生活及工作中的许多方面。张京京 (2020) 基于 CGSS 数据, 实证分析得出互联网无论是作为生产性使用还是生活性使用, 上网频率越高的农村居民, 其幸福感也越强^[8]。冷凤彩 (2018) 基于实证分析得出当居民使用互联网时, 其幸福感将比不使用互联网提高 14.1%^[9]。李羿枝 (2021) 认为, 使用互联网能够显著提升农民工的幸福感, 根据 ESR 模型的反事实分析, 若使用互联网的农民工不使用互联网, 其幸福感会有所下降; 若不使用互联网的农民工使用互联网, 其幸福感会有所提升^[10]。郭小弦 (2020) 指出, 青年人若合理上网, 将正向影响其幸福感, 但是若过分沉溺网络、脱离实际、忽视现实社交, 这些不合理的互联网使用行为, 将对其幸福感产生不容小觑的消极影响, 由此给出提示, 在普及互联网的同时要关注其带来的反向影响^[11]。对于相关研究有学者给出相反意见。马原 (2019) 基于 CGSS2015 年数据得出, 互联网使用频率对居民主观幸福感产生消极作用, 其原因可能是因为网瘾、网络暴力等带来的消极影响^[12]。

同时有学者指出, 在研究互联网使用时, 常常人们的收入水平会被关注, 而对于不同群体收入的比较通常会降低其幸福感^[13]。

二、变量选择与模型构建

(一)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选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执行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GSS) 2017 年的数据。根据本文研究需要, 从问卷核心模块 A 和社会网络模块 C 中选取有代表性的关于居民个人特征和社会特征的指标数据, 反映当前我国居民互联网使用与其幸福感的关系。本文以全体居民为研究对象, 根据内容需要对不必要变量进行剔除, 保留所需变量, 最终得到有效样本 9491 个。

(二) 变量选择

1. 被解释变量

主观幸福感。选取为“总的来说, 您觉得您的生活是否幸福?”, 根据表 1 所述对相关变量进行赋值和描述性统计, 下文不赘述。自评幸福感知均值越接近 5, 说明幸福感知程度越高, 样本中居民的自评幸福感知均值为 3.887, 说明对于幸福感知程度的整体评价较高。

2. 解释变量

互联网使用频率。由问卷中询问居民媒体 (上网) 使用情况进行表示。由表 1 可知, 对于互联网居民的使用频率均值为 2.781, 表明整体互联网使用较为频繁。

3. 中介变量

心理健康。根据问卷中表示居民心情的抑郁程度和沮丧的频繁程度的变量。根据表 1 可以看出, 选取的变量中居民的心理健康状况较好, 心理健康均值为 3.82。

4. 控制变量

个体特征中选取居民年龄、性别、户籍、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居住情况和健康状况; 社会特征中选取社会信任、社会交往、社会地位。

由表 1 可知, 样本中受访者的平均年龄为 51.57 岁。城镇户籍的人口数量高于农村老年人, 男性略多于女性, 占 52.49%。社会交往由与邻居和其他朋友进行社交娱乐活动共同表示, 得分区间为 2-14 分, 得分越高表示居民交往频率越高。社会信任由老年人对当前社会的整体态度表示, 得分区间为 1-5 分, 得分越高说明居民对社会信任程度越高。社会地位为老年人对自己社会地位的自评情况, 分值为 1-10 分, 得分越高表示居民自评社会地位越高。

表 1 主要变量的赋值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赋值说明	均值	标准差
居民幸福感	1-5 分, 分值越高, 居民幸福感程度越高, 1 为非常不幸福, 5 为非常幸福	3.887	0.824
互联网使用频率	1-5 分, 表示互联网使用频率由低到高, 1 为从不, 5 为非常频繁	2.781	1.695
心理健康	1-5 分, 分值越高表示心理健康状况越好	3.82	0.995
年龄	2017 时的实际年龄 (周岁)	51.57	14.345
性别	男=0, 女=1	0.475	0.499
婚姻状况	有配偶=1, 无配偶=0	0.993	0.085
户籍	农村=0; 城市=1 (将以前是城市现在是居民的也视作城市户口, 军籍视为城市户口, 将以前是农村现在是居民的视作农村户口)	0.355	0.479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1, 初中=2, 职高、高中及中专、技校=3; 大学及以上=4	2.169	1.074
居住情况	与配偶居住在一起赋值为 1, 未和配偶一起居住赋值为 0	0.868	0.338
健康状况	1-5 分, 分值越高, 健康状况越好	3.463	1.087
社会交往	2-14 分; 值越高社会交往越频繁	7.904	3.385
社会信任	1-5 分, 值越高信任程度越高	3.474	1.035
社会地位	1-10 分, 值越高自评社会地位越高	4.154	1.704

(三) 模型构建

由于居民主观幸福感为序别变量, 本文选用多元有序 Probit 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具体计量模型如下:

$$Happiness = \alpha_1 + \beta_1 Internet + \lambda_1 controls + \varepsilon_1 \quad (1)$$

$Happiness$ 为主观幸福感, $Internet$ 表示互联网的使用频率, $Controls$ 表示控制变量, α_1 是常数项, β_1 、 λ_1 表示各变量的待估参数, ε_1 表示随机误差项。

构建中介效应模型的具体方程如下所示^[4]:

$$Y = \lambda + cX + \mu_1 \quad (2)$$

$$M = \lambda + aX + \mu_2 \quad (3)$$

$$Y = \lambda + c'X + bM + \mu_3 \quad (4)$$

其中, Y 表示居民幸福感, X 表示互联网使用频率, M 代表中介变量心理健康。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 基准回归

为了确保本文所选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在合理范围内, 在进行基准回归之前, 本文先进行方差膨胀因子检验。结果显示自变量的 VIF 均值为 1.36, 且各自变量的 VIF 值均小于 10, 一般认为 VIF 值小于 10 时, 各个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程度属于合理范围。

本文采用递进回归的方法进行实证研究, 由表 2 中模型 I 可以看出, 在 1% 水平上居民使用互联网越频繁, 居民主观幸福感越强。模型 II 加入个人特征后, 互联网使用频率依旧与居民生活幸福感同向变动。同样模型 III 加入社会特征后, 这一结论依然成立。由此可以看出, 互联网的使用频率与居民自评幸福感之间存在正向影响的关系。这可能是由于互联网的使用, 一方面可以丰富居民的日常生活, 增加与外界的沟通, 可以很大程度消除居民的孤独感; 另一方面, 在日常工作中, 互联网的使用会让其工作效率更高, 工作方式更加灵活, 以此缓解了居民的工作压力, 从而提升了他们的幸福感。

从模型 III 可以看出, 年龄越大的居民, 其幸福度越高。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N=9491)

	居民幸福感		
	模型 I	模型 II	模型 III
互联网使用频率	0.064*** (0.007)	0.0362*** (0.01)	0.0360*** (0.01)
个人特征			
年龄		0.015*** (0.001)	0.011*** (0.001)
性别		-0.125*** (0.024)	-0.098*** (0.024)
文化程度		0.111*** (0.015)	0.071*** (0.015)
户籍		0.007 (0.029)	0.005 (0.029)
婚姻状况		0.202 (0.135)	0.106 (0.136)
居住情况		0.166*** (0.035)	0.152** (0.035)
健康状况		0.27*** (0.012)	0.226 (0.012)
社会特征			
社会交往			0.007** (0.003)
社会信任			0.166*** (0.011)
社会地位			0.131*** (0.007)
N	9491	9491	9491
Ps-R ²	0.0042	0.0409	0.069

注：***、**、* 分别表示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

(二) 稳健性检验

本文通过更换自变量的方式，对原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将自变量更换为“过去一年，您是否经常在空闲时间从事以下（上网）

活动？”，结果如表 3 所示，模型 V 加入个人特征，模型 VI 加入社会特征。闲暇上网频率在 1%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居民幸福感，更换自变量后结果与原模型结果保持一致，说明基础模型具有较高的稳健性。

表 3 稳健性检验（N=9491）

	居民幸福感		
	模型 IV	模型 V	模型 VI
闲暇上网频率	0.060*** (0.006)	0.038*** (0.009)	0.039*** (0.009)
控制变量			
个人特征		Yes	Yes
社会特征			Yes
N	9491	9491	9491
Ps-R ²	0.0046	0.041	0.069

(三) 异质性讨论

由表 5 结果可以看出，农村户籍和初中文化及以下的群体互联网的使用频率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城镇居民和初中文

化以上的群体二者无明显关系。

互联网使用频率对农村居民幸福感呈现积极促进作用，但是对城镇居民在统计学上无影响。

表 5 异质性分析

变量	居民幸福感			
	按户籍划分		按文化程度划分	
	城镇户籍	农村户籍	初中文化及以下	初中文化以上
互联网使用频率	0.007	0.05***	0.0540***	0.029
	(0.016)	(0.0125)	(0.0116)	(0.0176)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Ps-R ²	0.0738	0.0612	0.0663	0.0585
观测值	3369	6122	6210	3281

注：Yes 表示控制了控制变量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 主要结论

本文得到主要结论如下：第一，居民的幸福感受其互联网使用频率的正向影响。第二，年龄越大、文化程度越高、自评健康程度越好的居民幸福感越强；男性居民比女性居民的幸福感受更高；与配偶居住的人群幸福感强于不与配偶居住的人群。居民的社会特征中：社会信任、社会交往、社会地位对居民幸福感呈显著正向影响，即居民信任度越高、交往越频繁、自评社会地位越高的人群自评幸福感越强。

(二) 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结论，得到的主要建议有：第一，加强农村地区网络设施的基础建设，提高农村地区互联网的普及率，缩小城乡差距。我国城乡在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仍然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农村地区互联网的使用和发展与城市相比依然有一定的差距，应当逐渐普及农村地区的互联网使用，控制网络使用相关费用，加强互联网知识的宣传和教学，让农村群体“能上网、会上网、上的起网”。第二，改善特殊人群数字融入环境，降低网络使用难度。低文化水平的人群对于互联网接受更慢，但互联网使用对于该人群的幸福感受提升更明显，鼓励其通过互联网的使用来增加就业、学习机会，发挥互联网对其学习、就业和家庭方面的作用。第三，关注居民心理健康，加强心理疏导。心理健康是互联网使用对居民幸福感受影响的传导渠道，提升心理健康有助于居民幸福感的提高。

参考文献：

- [1]崔亚雪.我国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探究[D].天津财经大学, 2020.DOI: 10.27354/d.cnki.gtejy.2020.000758.
- [2]朱浚溢.中国人的主观幸福感:特征、来源与测量的研究[D].苏州大学, 2014.
- [3]温勇,陈静.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分析[J].人口与健康, 2021(10): 33-37.
- [4]Dolan.P., T.Peasgood&M.White 2008, "Do We Really Know What Makes Us Happy?A Review of the Economic Literature on the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Subjective Well-being."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29.
- [5]Anderson, R. E .2014, Human Suffering and Quality of Life Conceptualizing Stories and Statistics. New York; Springer.
- [6]Blancherflower, David G.&Andrew J.Oswald 2004, "Well-being over Time in Britain and the USA."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Organization 88.
- [7]Chou, Kee-Lee 1999, "Social Support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mong Hong Kong Chinese Young Adults."Journal of Genetic Psychology 160 (3) .
- [8]张京京, 刘同山.互联网使用让农村居民更幸福吗?——来自 CFPS2018 的证据[J].东岳论丛, 2020, 41 (09): 172-179.DOI: 10.15981/j.cnki.dongyueluncong.2020.09.019.
- [9]冷凤彩, 曹锦清.互联网使用具有幸福效应吗——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分析[J].广东财经大学学报, 2018, 33 (03): 4-12.